

第五章 软硬兼施,铁腕治军 精于“攻心”

凭靠着军人身份和军事资历而起家的阎锡山,当然深知“枪杆子”的特殊重要性,明白“失去军权必将失去一切”这一道理。因此,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他都始终牢牢把军队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且十分注重军队的“建设”。曾经就读于日本士官学校的他,不但把封建军阀的种种手段用于军队统治,而且很会“洋为中用”,把日本军国主义的那一套方法加以利用、发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阎氏治军术”。

一 “会说五台话,就有洋刀拷”:

阎锡山统治军队的手段

人 事

北洋军阀建军过程中,正是绿营与新军新旧交替时代,有许多派系的军队如直系和后来的西北军系以及他们的支系,都一贯拒绝录用学校出身的人充当军官。他们认为学生不仅不能冲锋陷阵,而且脑筋太活,不易统驭。直到民国十年左右,内战频繁,这种风气还未有显著改变。尤其是上述这些派系,一贯维持这个

风气直到它的消亡。它们部队之间虽偶尔用少数学生出身的人，亦只是点缀门面或者参与幕后工作而已。我是1921年被邀到山西的，体会阎锡山对于学生出身的军人和其他派系有些不同。他不仅对保定军校毕业的学生广为延揽，而且还利用这些人替他培养了一批有军事知识的初级干部。例如：最初建立学兵团后来改为北方军官学校，并相继成立许多兵科教练所，如工兵教练所、辎重教练所、机炮教练所和警察教练所等，为他后来扩编部队所需的基层骨干带来了有利条件。从表面看，他对人事上好像比其他派系开明，实质上是有其很狭窄的小圈子的。兹分别叙述之。

阎锡山对其幕僚长的人选是不分畛域的，这是因为对外的需要。谁与现代当权人物有某种渊源而能利用他来作联系的人，谁就是他选用的对象，例如，段祺瑞当政时期他是衷心拥段的人，于是乎他就选择段祺瑞的门生台寿民为参谋长。当阎锡山在1926年联合奉张直吴共同打冯玉祥时，因为台主张联冯，就把台寿民看押起来。在蒋介石当政时期，他选择了与蒋有关的辜仁发和朱绶光为参谋长。据我所知，阎锡山历次所用的参谋长没有一个山西人，但无论是谁都脱不了对外和对内的关系。兹列表如下：

1. 李 敏 字勉之，日本士官学校毕业，云南人。
2. 台寿民 字林逸，北洋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安徽霍邱县人。
3. 朱绶光 字兰荪，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湖北人。
4. 辜仁发 字达岸，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湖北人。
5. 石荣熙 字华岩，保定军官学校毕业，湖北人。
6. 楚溪春 字晴波，保定军官学校和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河北蠡县人。
7. 郭宗汾 字载阳，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河北河间人。

上面已经说过，参谋长的职权侧重在对外关系。凡是有关重要军政决策的事情，参谋长当然也是其中之一，但是，起主要决定因素的除阎之外，却另有一批骨干人物，如贾景德、赵戴文、张培梅以及后来居上的杨爱源、周玘、王靖国、赵承绶、梁敦厚等。他们没有一个省外人是。参谋长不过备咨询奔走而已。

阎锡山对带兵人的选择是有一定成见的。从外表看似乎是省内省外兼收，学生行伍并用，而实际上则有着极其狭隘的地域观念。他不但对省外的人有界限，而且对本省人更有亲疏之分。山西本来就有晋北晋南之分，事实上确有拥阎反阎表现。阎是晋北五台县籍，所以他的将领绝大多数是晋北人。不仅如此，在晋北将领之中也有亲有疏。他是以五台为中心逐步向临近各县开展。因而定（襄）、崞、繁（峙）、代不如五台之亲，雁北各县以及西北各县又不如定、崞、繁、代之亲。这种情况，在保定军校毕业学生起来之后显得更加明显。至晋南籍的将领，那就犹如晨星了。例如孙楚、傅作义、李生达等后来都为阎氏所疑忌。兹将我能回忆的师级以上将领的籍贯、姓名分别列出，加以叙述，以窥见一斑。

晋北地区的将领

张培梅（崞县）、张树帜（崞县）、傅存怀（忻县）、谢濂（繁峙）、丰玉玺（山阴）、王嗣昌（介休）、杨爱源（五台）、王靖国（五台）、赵承绶（五台）、杜春沂（五台）、温怀光（五台）、李服膺（崞县）、徐永昌（崞县）、贾学明（崞县）、周玘（代县）、冯鹏翥（代县）、杨耀芳（五寨）、荣鸿胪（浑源）等。

晋南地区的将领

傅作义（临猗）、孙楚（解县）、李生达（晋城）、杨澄源（临汾）、董其武（河津）、鲁应麟（运城）、马延守（河津）等。

省外的将领

杨效欧（湖北）、商震（始而保定、继而绍兴）、丰羽鹏（吉林）、孔繁霁（山东）、马开嵩（浙江）、李培基（河北）、关福安（吉林）、周原健（山东）、霍原璧（河北）、梁培璜（河南）、张荫梧（河北）、楚溪春（河北）、郭宗汾（河北）、吕汝骥（河北）、陈长捷（福建）、叶启杰（福建）、张厚安（山东）、李俊功（山东）、彭毓斌（湖北）、黄光华（安徽）、陶振武（安徽）、高鸿文（安徽）、孟宪吉（黑龙江）、方克猷（安徽）、李乐滨（山东）、李杏村（山东）、曾延毅（湖北）、孙兰峰（山东）、吕瑞英（浙江）、杨中科（河南）、刘譚馥（河北）、陈光斗（河北）、袁庆增（河北）。

根据上列师级以上将领，从籍贯上看似乎阎锡山用人没有畛域之分，但仔细分析一下，就可看出他的狭隘性了。

这批人是从1921年至1938年以前包括阎锡山闭关自守至抗日战争时期（1921年以前和1938年以后因我不在山西，故略）的全部将领。这其中来来去去，有如走马灯一样，不是某个时期的全部人物。这是第一点。

上述人物中以保定军校出身的为最多，也正是阎所要培养的人。1926年以前，阎尚未参加内战时期，因保定学生资历尚浅，素望不孚，势必借用旧关系的人维持局面。例如，在1926年以前，他的基干人物是商震、马开嵩、孔繁霁、张培梅、张树帜、傅存怀、谢濂等。这时保定学生官阶最高的如杨爱源、荣鸿胪只是团长阶级，而傅作义、赵承绶、王靖国、李服膺、周玳等不过是营连排长等阶级，无中心人物可言。这是第二点。

上列外省将领中除少数几个人如商震、杨效欧、张荫梧、陈长捷、楚溪春、郭宗汾等为阎直接引用以示不分畛域而且都未能与其共始终外，大都是阎的亲信从同学同乡亲友中拉拢而来的一

些支系人物，他们虽然也经过阎的考验，但不过是些偏将、打手。白虎堂运筹帷幄，他们是没有资格的；冲锋陷阵，他们要站在最前列；论功行赏，他们要站在最后边。这是第三点。

外省将领和本省主要将领都有依附关系。这种关系不是建立在同学上，便是建立在利害关系上。例如，李培基、高鸿文、黄光华、李杏村等是依赖商震的关系。董其武、鲁应麟、曾延毅、袁庆增、陈长捷、孙兰峰等是依赖傅作义的关系。张荫梧、楚溪春、刘穉馥、李俊功、贾学明、郭宗汾、彭毓斌是依附李服膺的关系。孟宪吉、陶振武等是依附孙楚的关系。方克猷、吕汝骥、陈光斗等是依附徐永昌的关系。周原健、张厚安等是依附赵承绶的关系。梁培璜、吕瑞英等是依附王靖国的关系。霍原璧、李世杰等是依附李生达的关系。其中也有一些人后来与阎发生直接关系，如张荫梧、楚溪春、郭宗汾、陈长捷等，也只不过是一时的利用，谈不到什么亲密。这是第四点。

上述四点说明，阎锡山自1926年以后直到把晋绥军扩大到最高峰时，这种现象更加显著，最高决策权便落到少数几个人手中。凡是决定策略以及军队运用之权，除阎之外，只是杨爱源、周玘、王靖国、赵承绶参与，连徐永昌、孙楚、傅作义也不能参与极机密的决策。

反过来看一看阎锡山是怎样维护他最亲近的而又始终如一的五台系将领。1927年第一次“北伐”时，阎令懦弱无能的杨爱源任前敌总指挥，并以徐永昌为副总指挥，结果因指挥失当为东北军击溃，龟缩到太行山区凭险固守，阎这才改任徐永昌为总指挥。杨爱源不但未受制裁，反被任为副总指挥，实际上仍负控制全军之责。1930年阎、冯联合倒蒋之役，赵承绶率领骑兵一军参与陇海方面作战。在当年6月间，赵奉命协同郑大章迂回商丘截敌后路，因赵畏缩不进，致俘蒋任务功败垂成，冯愤懑异常，

因向阎建议把赵承绶就地正法以振军威。阎不但不予理睬，反把逃将收容，照样让他当骑兵司令。1937年抗日战争中的晋南石口一役，因王靖国部作战不力，军法执行监张培梅极力主张把王枪决，阎不准许，张培梅服毒身死。王始终为阎所信任。根据以上三例，可以看出阎锡山所谓“用人唯公”完全是假面具了。

那么阎锡山又是怎样对待晋南一些将领的呢？首先谈谈孙楚与阎的关系。孙是晋南解县人，保定军校第二期毕业。孙对旧学和军事学在山西将领中是比较有基础的，并有智囊之称。他和杨爱源的关系始终搞得很好。因杨为人庸懦，无论平时战时，端赖孙为他策划，尽管阎对孙有所疑忌，但杨一直从中维系。孙对阎则唯命是从，忠心耿耿。人们都知道，徐永昌之归阎是孙以身家作担保的。1936年晋西战役，阎不满孙的战绩，竟把孙调任一个空头军长。徐为顾全孙的面子，把三十三军的番号让给了孙，后来徐任国民政府的军令部长，劝孙到中央任次长，孙辞谢未去。阎使孙负责省防工事，他日夜从事调查研究工作，根据德国吉格弗里得的精神，把太原城防搞得很坚固。可惜这个工事在抗日战争中未起任何作用，反倒在内战中起了一定的作用。1929年冬，阎、冯联合倒蒋之前，为了联络在河南的各驻军，阎令孙部和杨耀芳部开驻黄河南岸的荥泽县，并以马延守师进驻郑州。这时拥集在郑州及其附近的诸军主要有韩复榘、石友三、万选才、刘春荣和以上官云相为代表的王金钰等部。同时，衔蒋介石之命对上述诸军负奔走拉拢之责的何成浚也在郑州。在阎锡山未到郑之前，第三集团军方面是由孙楚负主要责任的，双方终日花天酒地，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当然以上这些军队无所谓拥蒋拥阎，他们所追逐的只是金钱和地位。尤其韩、石二人，本是冯玉祥的叛将，在阎、冯合作情况之下，他们不能无所顾忌，只要安排得法，韩、石是可以争取的，但阎锡山对孙楚却多方限制。曾

记得有一次阎给孙一个电报，内容有这样的话：“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意思是责孙不要滥用职权。结果韩复榘因所欲不遂弃阎投蒋，阎到了郑州，韩竟密议扣阎献功。刘春荣是参与密议者之一，他把这一消息告知阎锡山，阎当晚即化装坐一铁闷车北返。因而把战争推迟到1930年春季。即此可以知道阎对孙的不信任了。石友三是在津浦南段反过蒋介石的人，在这次勾结中他当然不能投蒋，阎就委任石为山东省主席，却不让他组织省府，也不让他就职，只令他率部在陇海方面作战。当阎部在津浦方面失败时，石也率部渡河，堵截阎部的归路。另外刘茂恩依附山西，也为的是争夺河南地盘。迨阎委万选才为河南省主席后，刘也在陇海线杀万投蒋。这不过是顺便谈谈阎锡山用人疑人之例而已。在抗日战争期间，孙楚一直顶着空头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做些不指挥作战的幕僚工作。直到第三次国内战争末期，阎锡山、杨爱源都逃出山西，他还伙同王靖国负隅太原，终至被俘。孙之于阎，可算是以德报怨了。

其次看一看阎锡山与傅作义的关系。傅作义是晋南临猗县人，保定军校第五期毕业，在“北伐”以前，阎同傅的关系总算保持得很好，尤其在孤守涿州一役，阎对傅是信任的。赶到阎占领平津之后，任傅为天津警备司令。此后傅即和蒋发生了微妙关系，这是最触犯阎氏忌讳的事。后来傅作义接受绥远主席的任命，与其说是阎的同意，毋宁说是蒋的强迫。当时的绥远，毕竟还在阎的势力范围之内，为了缩小傅的权力，阎任王靖国为绥西屯垦会办，坐镇包头，控制绥西各县的行政权限，又委赵承绶为骑兵司令，控制绥东各县的政权。身为省主席的傅作义，其权力只能行使于省城附近的几个县。抗日战争开始后，阎锡山借口兵力不足，决心放弃绥远，把傅部调回山西，平型关战役时任傅为前敌总指挥，受杨爱源的节制。平型关、忻口战役相继失败后，

阎又令傅死守太原城。类似这等困难任务，阎绝不会叫他的心腹去承担。当太原沦陷退保临汾时，蒋介石突令傅率部进驻陕坝，归复绥远又触了阎氏之忌。此时，蒋顾虑傅仅以一个三十五军兵力不敷，令阎把陈长捷的六十一军交傅指挥，并允阎另成一军以补陈额，阎坚决不让陈部开拔。不仅如此，阎还把原配属三十五军的一个炮兵团限令在中途停止前进，观此足以证明阎、傅芥蒂之深了。

最后再看一看被刺身死的李生达。李生达是晋东南晋城县人氏，保定军校第五期毕业，他同样从排连长擢升到军长。1933年被指调到江西参与第五次“围剿”。经他的小同乡苗培成（苗任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拉拢和蒋介石发生了关系。当红军北上抗日后，阎锡山即令李率部返晋。他逗留在津浦线南段迟迟不进。到了1935年红军假道山西抗日时，迫于形势，蒋介石不得不令他率部返晋参加晋西的反共战役。战争结束不久，他就被他的随从卫士刺死在晋西的柳林镇。总之，阎锡山生平最烦恶他的部下对外发生关系，这种现象偏偏发生于晋南籍的将领，无怪他对矢志无他的孙楚一直不敢信任了。另外还有一位与阎同在日本毕业的温寿泉，自始至终阎对他是敬而远之，从未任过重责。还有一位任过傅部军长的鲁应麟，也是保定军校第五期毕业、晋南籍，但他是依附傅作义的关系，从不被阎所重视的。

综观上述情况，阎锡山对于军事人员的选拔是有一定规律的，同时也是极其狭隘的。他既需要你勇于替他卖命，更需要你对他忠诚不贰。他在表面上好像是用人不分畛域，实质上是圈圈套圈圈，一层又一层地划分着。只有少数几个核心人物，不是同乡便是亲戚作为他的心腹。除此之外，他对某些不信任的人，一时加以利用，甚至推完了磨杀驴吃。如商震、傅作义便是明显的例证。我记得在庐山“受训”时，蒋介石的部下刘健群在公开演

讲时曾这样说过：“阎锡山妄图称王称霸，就好像缠足的妇女，扭扭捏捏，一步也走不开……”当然，刘之讥阎并不单指军事而言，可见一丘之貉也有轩輊之分。

编制和装备

山西军队的编制在 1924 年以前即所谓保境安民时期，只有四个步兵旅，两个独立歩兵团，四个炮兵营，一个骑兵团，一个工兵营，一个辎重营，一个机关枪营，总兵力不过两万多人。当 1924 年阎锡山决定联合段祺瑞、张作霖打倒曹、吴，出兵石家庄阻止豫境的吴部北上时，仅仅派了两个歩兵团，各配属一部炮兵，虚张声势把沙河铁桥炸毁，竟使吴部不敢北上。从此以后，阎锡山把“保境安民”的伪装撤去，从事扩军备战。1925 年冬，阎锡山又反过来联合吴佩孚、张作霖打冯玉祥时，即已形成周玳回忆中所写的编制。到了 1928 年，阎把奉张打出山海关以后，已拥有晋、冀、察、绥和平、津两市的地盘，他便尽量收编和扩充他的势力。1929 年时，他已扩充到以军为单位、大约 15 万人以上的部队。因为当时军队番号时而接受中央统一编制，时而私自制定自己的番号，我也无法列表了。总之，阎锡山参加内战不过四五年时间，即把军队扩大到数倍之多。这个详细的编制，希望知之者加以补充。

基层单位的编制和装备也和当时各派系军队一样，没有较大的出入。有一点值得介绍的是，在 1925 年阎开始扩军时，曾规定营的一级作这样的编制：一个歩兵营辖三个歩兵连、一个重机枪连（机枪四挺）。每个歩兵连的人数为 144 人，即每班 16 个人（包括中士、下士各一人），装备轻机枪一挺、冲锋机枪一挺、步枪八枝（我曾当过这种营长）。通过 1927 年在雁北的反冯战役，证明它的战斗力很强。从精兵简政来说，确有可取之处。后来阎

部不断扩编，限于制造军械的能力，这种编制不能普遍实现了。

由于阎锡山把搜刮来的金钱不断用以扩大兵工厂制造设备（后面有记述），所以部队装备在当时是比较完整的，步机枪的口径比较划一，弹药补充也比较方便，特别是炮兵包括75毫米至105毫米各种类型的山野炮竟扩充至10个团之多，平时把炮兵集中于炮兵司令管训，战时按需要配属于各军师使用，一般情况下每个步兵军可以配属一个炮兵团，以团长为炮兵指挥官。这在当时军阀中，除去东北军之外，战斗力算是比较强的。另外，手榴弹也是山西军队的一种有力武器。这种武器因为结构简单、造价低廉，能够大量生产，又因山西军惯于沟壕作战，很容易显示它的杀伤力。1930年在陇海线上兰封战役中，蒋介石的军队曾因此受到很大的损伤。此外，在山地作战时，还有重型手掷弹、



阎锡山（左）与何应钦检阅骑兵（1935）

手雷、滚雷等威力更大的爆炸物，1927年阎军被东北军和平汉线击败后退缩到太行山区时，也收到显著的效果。

骑兵在多山的山西省是不甚受重视的，只有在取得归绥地盘后，才以赵承绶任骑兵司令，收编当地的骑兵，编成了两个骑兵军。在陇海线作战时，也未起什么作用。

工兵和辎重兵虽都设有司令部，但在历次作战中都未起多大作用，也就不作重点叙述了。

卫生部队在各团都有医疗设备，各营有包扎设备，在各兵站沿线设有伤病医院，对于伤病员的运送则依靠民夫。

训练和作战

前面已经说过，阎锡山因为自己是日本士官学校出身，他选用干部是以学生出身为主。这一点与东北军稍有相似之处，而与直系和西北系则相反，因此阎在练兵方面把重点寄托在干部身上，不像冯玉祥官兵一齐抓。为检验部队，阎设立了一个陆军整理处，该处专门管理部队训练、编制、教育，修编各种典、范、令以及考察、点名、发饷等事。

阎于华北在未参与军阀混战时，把精神完全寄托在消极防守上，所以他无论在部队教训、兵器制造以及战斗演习等方面，多偏重于静止的战斗方式，缺乏机动的训练。后来，他的政策变了，部队也扩大了，可是在省外几次战役中始终保持着这种风气，于是有“山西军队长于守而拙于攻”的讽刺，事实也确是这样。现举阎的一些练兵特点：

1. 精神训练

阎根据曾参的“吾日三省吾身”的说法，提倡官兵不断进行“自省”，在省内外遍设“自省堂”每个步兵团或独立营的驻地均建有自省堂，作为每周一次“自省”之用。其内容无非是使各地最高级的首长选用一些激励人心的“古圣先贤”的事迹或语录，使各级官兵都知道“亲其亲，长其长”，“吃谁要向谁”等等。在部队扩编后，这种封建统治的办法也就随之消逝了。

2. 技术训练

阎最注重射击训练和劈刺术的训练。我还记得他有这类的标

语：“上兵能以 30 粒子弹打一个月的仗是会打仗的士兵；军官能教会士兵以 30 粒子弹打一个月的仗是会教兵的军官。”又有“一弹中一的”的号召。他常说，我宁愿拿更多的子弹让你们平时去打靶，不愿拿一粒子弹在作战时去浪费。别看阎氏爱算小账，可他对射击奖金是不吝惜的。从连到团，各级优良射手只要能经常保持在六环以上，都可领到射击奖金。一个战斗兵如果成绩优良，在各级竞赛中年可得奖金二三百元之多。如此相习成风，山西军队为了打内战，在射击上是有一定成绩的。

另外，阎也十分重视劈刺术。他把过去受过劈刺术教育几个成绩较优的人，如孟宪吉（黑龙江人）、陶振武（安徽人）、高文焕（河北人），不惜重金高位从省外聘请来，担任全省劈刺教官，并让他们轮番到各部队训练初级干部。他还不惜重金到南方各省采办竹子和皮革制造护具。在部队未扩编前竟能使每连经常保持护具在 25 副，这在当时也是很少有的事。这样一来，山西部队对防击战术是有一定成绩的。但是，部队扩编后，这种技术也就废止了。

3. 战斗训练

上面曾经说过，阎锡山的战术思想是建立在消极防击方面的，如此相习成风，后来在战略上该采取攻势的时候，如反蒋战役，无论在津浦还是陇海方面均不免蹈过去的覆辙，贻误许多有利的战机，终致失败。兹举阎亲自主持战斗的一例说明之：

1924 年左右，阎经常指定一部分部队集合许多高级将领到野外作战斗示范演习。他规定在散兵壕沟内的守兵，对进攻的敌人在 200 公尺以外不准射击。令守兵装好一排子弹（空包），限定从 200 公尺敌人前进时，发射第一粒子弹。估计敌人每 30 至 50 公尺跃进一次，可以有三次的跃进。每次敌人跃进时，守兵就发射一粒子弹。当残敌进入手榴弹投掷范围内时，守兵作一次

手榴弹的投掷。这样一来，剩下的敌人也就无几了。然后再令守兵以最后一粒子弹（定名沟口弹）把残敌消灭干净。并令各部队一律采取这种方式反复训练，这就演成了一种形式主义。有一次商震对阎说，督军这样的杀敌办法，确有致胜的价值，但是，军队作战不能局限于一种方式，凡关运动战应具备的一切条件，都应当锻炼。阎立刻沉下脸来说，是谁不让你们锻炼的？商也就沉默不言了。下面的各级带兵官，谁还敢不迎合阎的意旨？于是官兵在无形中养成一种静止不动的被动作战方式，相习成风，自然缺乏攻击精神。

例如，1927年阎军和东北军作战于保定、定县之间，横跨平汉铁道两侧，两军竞相延伸战线进行拉锯式的战斗，把第二线的兵力全部使尽。结果东北军以戢翼翹一个军从右翼迂回过来，整个战线崩溃，阎几乎被擒。所幸有太行天险足以凭守，否则连老巢也保不住了。这次战役是阎亲自坐镇东长寿而由杨爱源担任前敌总指挥的。这说明阎锡山既无将兵之能，又无知人善任之才。

此外，阎在作战时，往往于千里之外干涉前方指挥官的权限。例如，平型关战役，由于阎受某部队长的越级要求，把总指挥杨爱源所确定的攻击时间推迟了一天，失却了作战机宜，竟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在遇到需要亲莅指挥的时候，倘若敌方有压力，他就会不顾一切先行逃跑。例如1930年反蒋战役中，他是津浦方面的总司令。总司令部原设在禹城。蒋介石侦知后派飞机狂炸禹城，他就逃回石家庄。攻下济南后，傅作义、张荫梧两个总指挥发生了东进南进的分歧，因为没有最高决策人，他们就各干各的，蒋军乘隙袭取了济南，使本来持观望态度的东北军乘机开进关内，造成土崩瓦解的局面。上述数例，都是在作战的成败关键时，由于阎锡山贪生怕死，独断专行，而告失败的。在北洋

军阀混战中，他比起直、奉和西北军等派系确有逊色，但在当时的混乱局面中，他善于投机取巧，凌驾于他人之上。

官兵待遇和带兵官的弊端

山西军队官兵的平时待遇，也和当时各派系军队一样采取雇佣制。在官兵经济生活方面有很大差距，士兵之间从副兵到上士分为五级。最低级的副兵月饷是六元三角，最高级的上上月饷是15元，差距不到两倍半。军官之间包括准尉在内分为十级，最低级的准尉月薪是24元，最高级的中将（当时除阎锡山之外还没有上将）月薪是500元。他们的差距大约是21倍，若是以副兵收入和中将作比，差距约为80倍。这种情况在旧军队中是普遍的，但不择手段向上爬的思想是每个人所具有的。常听人言：“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当时许多军阀头子不都是草莽出身吗？所以在这种不平等形势之下，只能相安一时。其军官之间有主官与非主官之分、兵种之分。同一阶级的军官如果不是带兵者，则贫富就更加悬殊。例如一个步兵连长除去正薪之外，平时有公杂旅费可以揩油，战时有谍报费可以捏报或者掳获品可以隐瞒，另外还可以吃空额、喝兵血。这在一个同阶级的参谋或者副官等就难和他比了。至于特种兵科的带兵官，其弊窦之多又远为步兵科的带兵官所望尘莫及。旧军队中有句俗语：“金辎重，银炮兵，骑兵油水也不轻。”这说明这些兵科的带兵官除去和步兵一样舞弊外，还有不能说话的马匹、火炮、车辆和装具等，每月都有一定的经费。例如马匹除去克扣马粮外，马粪可以出卖，马掌可以捏报。火炮则有一定的炮油经费，车辆则有修理补充等等，还可以吞蚀和虚报，弊端之多，不胜枚举。山西的辎重兵因为战时征用民间车骡，所以很少编制。炮兵在山西是比较强大的。在阎锡山最盛时期，编有10个炮兵团，统由炮兵司令官集

中管训。骑兵在占有归绥后，曾编成两个军，也置于骑兵司令官统一管训之下。根据上述情况，这两位司令官是山西军官中最雄于资财的人。我们只要查一查他们过去在太原的住宅和晋祠的别墅，就可以概括其余了。当然，山西各级将领发了横财的人并不限于这两位司令官，仅述其较特出者而已。

补 给

1. 平时补给

平时补给是对上兵的给予，除去月饷外，有被服、军帽、皮带、军鞋、帐篷和炊具等。这一切在山西均设有专厂，原料也勉强能自给。在部队未扩编之前，不仅在数量上能勉强维持，而且在质量上也较耐穿耐用。类如棉、皮大衣以及皮靴、皮鞋等，在一定时期内也有发给，迨部队扩大后，作战频时，冬夏服装既不能按时发给，质量也不耐久。士兵往往拆冬改夏，鞋子更不够用。其他如雨衣大衣则视执勤需要，偶然在连队中发给几身。如果是长期作战，衣不蔽体的现象也常有。

平时上兵伙食照例是由饷内开支。特务长（后改军需上士）和伙夫负经理炊事之责。主食以玉米和小米为主，每月只能吃白面四至五次，副食以蔬菜为主，肉食除节日外每月不过一两次而已。有时为了节省主食，也有使士兵多吃肉食的，那就看经理人是否善于调配了。在当时物价比较稳定的情况下，每个士兵每月伙食费大约在两元五角上下。

2. 战时补给

在作战时，从动员那天起，士兵伙食即由公家无偿给与。按照山西规章，在动员前即设立兵站总监部，负责筹划一切作战物资的补充，视需要筹设若干补给线并成立分监部。1926年以前，山西首任兵站总监是黄国梁。这时候山西部队尚未扩编，

兵站业务比较单纯，黄虽爱钱，但还能替部队办一点好事。他仿照日本办法，在给养方面准备很多肉类和菜类罐头。在保存、运输和使用上都有很大的便利。在主食方面，他也制成许多盐饼干按定量做成包件，战斗紧张时，可以免去部队饥饿或因吃饭问题误了戎机。此外，他对弹药补充、交通工具的调度也很重视，为当时军阀混战中其他派系所不及。黄是陕西籍人，与阎又是日本同期同学，同时在经济和人事方面常常与阎发生龃龉。1927年以后，阎将其撤换，以周玘接充。从此部队越扩越大，无论在物资调配方面还是交通运输方面，都是求过于供，较之以前大有逊色。

抚恤

抚恤工作是对军队官兵作战起鼓舞作用的一种极为重要的措施。在过去军阀混战时代，士兵全是募集而来，军官也多为行伍出身。他们为了个人生活来自四方，抱着“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想法，大都无家可归，甚至连姓名也是假造的，对于抚恤也漠然视之。在山西军制中也曾订有抚恤条例。对作战伤亡的官兵有一次抚恤金、常年抚恤金等等都规定得若有其事。最初部队不多，战役不大，官兵的伤亡只要有家氏可考者，曾照章办理过。后来战争频繁，部队扩大，作战时间拖长，伤亡数字增大，抚恤工作无暇及此。1928年北伐时期，我当独立团长，在河北省完县康关战役中相持至六个昼夜，官兵伤亡几至半数。在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我指挥的三个步兵团、一个炮兵营，经过半年多的激战，官兵伤亡何止千人。阎锡山逃跑到大连，把库存的几十万现金分散给少数亲信，数以千计的伤亡官兵有谁来管？抚恤条例成了骗人的具文。

（陶振武）

二 “士兵代表会议”、“尊军献肉”与“铁训会”

阎锡山在 1947 年至 1948 年，曾在太原召开过“士兵代表会议”，时间是在 1947 年的夏天；并在 1947 年 10 月起至 1948 年年底办理过“尊军献肉”来实现他的“改善士兵生活”；又于 1947 年冬至 1948 年 7 月，在太原汾河西岸万柏林营房办理过“铁训会”，在士兵中发展他的反动的“三三铁血团”组织。在阎锡山这三项活动中，我都参与其事。在召开“士兵代表会议”时，我是担任大队长的职务；“尊军献肉”是归“整军会议”的“生活组”，我就是该组的少将组长；在办“铁训会”时，我又兼着该会的事务处少将副处长。谨将能够回忆起来的写述于下，以供参考。

“士兵代表会议”

1947 年汾孝战役后，阎锡山占据的地盘在晋南只有临汾、运城两孤城，在晋北也只有大同、应县两地，在东路勉强控制着正太铁路，就是以他的反人民的根据地太原城为核心计，也不过是南至介休与汾阳、孝义等地，北迄忻县而已。至于他手下的兵力，虽然是号称有 10 万之众，但临汾已派出六十六师，大同又抽走了暂编第三十八师，忻县又不得不派暂编第三十九师与第四十师去把守，在介休、平遥、汾阳等地由第十九军与第三十四军驻防，他背上了这许多城池的包袱，以致不得不分散了他的兵力，这样一来，能机动的部队自然是寥寥无几了。当时仅有第三十三军与收编的日本部队还可以抽调出来，但是在汾孝战役中，先有孙楚率领的两个师被解放军包围于李家梁一带，后有赵承绶指挥的两个师在中街村遭到同样的命运，这四个师虽均前后逃出，但已溃不成军。至于在汾孝战役中被解放军打垮的第十九

军、第三十四军以及收编的日本部队等，也都成了惊弓之鸟。使阎锡山最感头痛的是，不仅兵源无法开展，而更重要的还是士气低落与兵无斗志。因之他就异想天开地来召开“士兵代表会议”，满以为拿上他这“至尊的土皇帝”身份来召开其军队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士兵代表会议”，就可以使这些“代表们”受宠若惊，回到部队中能起振作士气的作用，使士兵们为他效力，甘心作他的炮灰，但结果事态的发展是朝着他这如意算盘的反面，并没有挽救他注定灭亡的命运。

（一）会议的实质

甲、代表们的产生及成分

按阎锡山所下的命令是着各营连的士兵推选代表（每连二人，准确数字想不起来），但在实际行动中这些代表们都是由营连长挑选后，再经团、师审查决定的。因之这些代表们自然是最听话的人，加上这些代表们在会议前先由其所属的军官一再教给他们在会议期间要怎样说话和说些什么话，要对阎锡山表现出忠诚的态度来，这样对他们将来升官的前途是有着密切关系的，至于部队中士兵生活的苦自然是在严禁暴露之列了。因此这“士兵代表会议”名义上是“士兵代表”，实质却是代表着军官，是军官们的传声筒罢了。

乙、阎锡山欺骗士兵的鬼把戏

阎锡山的士兵来源有二，一是在抗战期间，国民党中央政府在河南省南阳一带的师管区给他补充了几个师的兵力；一是阎锡山的反动“兵农合一”政策，其办法是将村内所有的土地、壮丁二者结合起来，平均每壮丁三人为一小组，分地若干，再将小组土地分为三份，每人一份，这三人中之一是常备兵，其余二人为国民兵，常备兵的土地即由同组的国民兵代为耕种。这些土地大多数都是抽自地主的，并规定要给地主交纳 1/10 的地租。这个

阎锡山自鸣得意的“兵农合一”政策，并没有彻底执行也根本不可能彻底执行。当时各农村中对土地只不过是明分暗不分，所有常备兵也只能从劳苦人民中强抓乱拉而已，但是有的地方还是多少执行着这个政策，因而在常备兵中有的是一年能多少得点粮食与棉花的，也有的是用法币雇来的，而被迫抓来的还是占相当大的比重。至于由河南拨来的那批士兵，因为在山西根本无籍贯，从而也就根本谈不上“分什么地”“得什么粮棉”或是什么法币了，自然山西籍的士兵如果原籍已经解放，他们的处境也自然和河南籍的士兵是同样的了。阎锡山对待这批代表们，除了以他是个“至尊”的身份，来和小小的士兵代表开会，这真是“天子爱庶民”的作法，一定是受到这些“代表们”爱戴与拥护的唯心观点外，还用了开空头支票的办法来诱骗这批代表们为他作说客作活宣传品，那就是他对士兵们“安家立业”的问题。他对这批“代表们”一再讲到，既要彻底执行“兵农合一”政策，也要对外省籍的士兵在将来消灭共产党后，将他们分配到山西各县去“安家立业”，本来这些在日本人投降后就可以实现的，只是由于解放军的“捣乱”，所以“兵农合一”政策作的不够彻底，使本省籍的士兵不能得到全部应得的粮食与棉花，使外省籍的士兵也不能立时分配到各县去“安家立业”，因此你们（指代表们）必须认清这是共产党害了你们，在打仗的时候要狠狠地打解放军，只有将他们‘打垮’了，并消灭了共产党，你们才能“安家立业”，你们自己要这样做，也要全军士兵这样做。这是在会议期间阎锡山对代表们的讲话实质，说穿了，就是阎锡山要士兵们先给他作炮灰，然后他再给已经作了炮灰的士兵们去“安家立业”。

177

（二）对代表们的“礼貌”

汾孝战役后我离开了暂编第四十一师参谋长的职务，在太原

我的家内住了三四个月，这时我的底缺是国防部少将部员，留在山西服务，但薪饷领发须在山西军官总队，当我向该队领取薪饷时，队长祝秉钧对我说：“王总司令（王靖国）着你速去见他。”这时王靖国既是第八兵团司令官，又是“整军会议（三三铁血团）”的负责人，于是我在“整军会议”见到了王靖国，王说：“三天后会长（指阎锡山）将召开‘士兵代表会议’，时间是一个星期，并派你为大队长，负责管理士兵代表。至于代表们的生活问题，由太原绥靖公署副官处处长安忠厚负责，可径与他接头，每日大会议程由‘整军会议’承办。”我和有关各处接头后，就在太原府西街小学内为代表们布置了住宿的地方。当代表们来到时，我将他们所带的枪支及手掷弹子弹等，按照预定计划收集起来，放在副官处指定保管的地方。这是预防发生意外的一个措施，也就是说，阎锡山一面高唱要亲自和士兵代表开会，一面却害怕这些士兵有对他不利的举动。当然我更顾虑万一出点乱子的话，那责任我是吃不消的，于是我一面对代表们说“开会不带枪支，须要妥为保管，”一面却对他们身上与背包等，一个一个地作了细密检查，并宣读了预先规定好的几项纪律，大意是：不得在室外活动，更不用说有出入大门的自由了，晚上熄灯号后，更不准出房一步，大小便均须向守夜者（军官总队几个学员）报告，经许可后才能赴厕所。这样这批代表们如同犯人似的被我管理起来了。当天下午王靖国来到这里，向士兵代表们讲了话，大意是叫这些代表们对阎锡山有要说的话可以作些准备，填写在“要向会长说的话表”上，预备阎锡山的传见，同时又讲了些阎锡山关心他们的话。总之，是给士兵代表灌了数不清的“米汤”（好听的话），当然这些代表们能得到总司令来看他们，并且听了阎锡山关怀他们的话，于是就眉开眼笑地活跃起来，也有的因为一贯受着非人道的待遇，突然受到这样的“礼遇”，不知是搞什

么名堂，所以就呆若木鸡，一动也不动了。我看了这种情况后，在王靖国讲话中间，领着代表们喊了些口号，情绪就更“活跃”了。而把他们当作囚犯看待的一点，自然他们认为是应当遵守的规定，当然我这些管理的作法，王靖国是非常满意的。

（三）会议中振作士气的两件“法宝”

会议期限原定是一星期，实际上除开代表们到达与返回部队的两天不计外，会议只开了五天，在这五天中，阎锡山为了振作士气祭起了两件“法宝”。

第一件“法宝”是：阎锡山要激起士兵仇恨共产党的心理，要叫士兵们拼命和解放军干到底。前三天的会议中，每天阎锡山有一小时的讲话，其内容是：解放军在全国各地都是“节节失败”，共产党是“祸害”老百姓的，是老百姓的“仇人”，你们今天不能“安家立业”，正是解放军“害了你们”；他要求全军士兵都要以牺牲的精神来对付解放军，彻底作到“有我无共，有共无我”的“好”军人。其次，太原绥靖公署各处处长作与军队有关的报告，这些都是在绥署“自省堂”进行的。每当阎锡山出席与退席时，除了军乐队奏乐外，王靖国指定我带着士兵代表喊“欢迎会长”“拥护会长”“会长健康”“会长万岁”的口号；在阎锡山讲话的间隙，王靖国也亲自带领着呼些反动的口号。这些代表哪里见过这样的军乐队、扩音机，以及富丽堂皇的大礼堂，精神上有说不出的感触，至于阎锡山讲了些什么，各处长报告了些什么，他们根本是听不懂的，这样只有在每天下午在府西街小学内，再让他们“讨论”（实际上是我和其他管理人员给他们重复一次）。

第二件“法宝”是阎锡山鼓舞士气的唯武器论。会议的第四天由我带领着代表们参观了太原兵工厂所属的步枪厂、轻重机枪厂、迫击炮厂、山炮厂以及手掷弹厂等等，连阎锡山一再自吹自

播的“山西自造”（实际上是用旧零件装配成的）火车头——“复兴号”也参观过了。在参观的前一天阎锡山曾对代表们说：“明天你们参观一下兵工厂，军械处可通知兵工厂着准备一下。”参观后的当天下午，王靖国给代表们讲了话，内容是：第一，参观兵工厂是最难得的机会，这是会长对你们的照顾；第二，共产党没有兵工厂，解放军注定要失败的；第三，你们回去要狠狠地打解放军，枪炮子弹咱们有的是……

（四）阎锡山的“传见”

会议的第五天，阎锡山“传见”了全体士兵代表，地点是在绥署东花园办公室内。阎锡山坐在桌子的正中央，面向南方（意思是天子面南），士兵代表们鱼贯而入，由西边门进来，东边门出去，并将预先填好的“想给会长说的话表”放在阎锡山的面前，由“整军会议组织组”少将组长黄国桢先叫代表的姓名，被叫者应声“有”后，即对正阎锡山行90度鞠躬礼，接着由黄国桢宣读那张表上的话，就算是传见完毕。当时我站在阎锡山身边，一面指挥代表们的行动，一面防止有意外的举动，室内还站有四个荷枪实弹的“御林军”——阎锡山的警卫队，而阎锡山只看那表上的话，对代表根本没睬一下。至于这些代表们都是由各部队师、团长们亲自挑选的，临来的时候，又是经过一再叮咛过的，因而在那表上几乎是青一色的写着反对共产党拥护阎锡山的话，所以在传见后，阎锡山自然是很满意的了。当天晚上阎锡山召集军政人员开会时，曾指出这批代表中有一位是某部迫击炮连的，在表上填着：“我们迫击炮驮鞍皮条坏了，多次请领不到，对作战很有影响，请会长办理。”阎锡山说：“你们（指出席的人）看，人家一个当兵的还这样关心我们的事，我们还能不如一个士兵么？”并且要军械处将这项皮条，直接发到该代表的手中。

（五）一顿饺子似卖命文契

会议期间“代表们”的伙食是由太原坝陵桥“公共食堂”承办的，这里距府西街小学往返有二三里的路程，因之，每天两餐，即占去很多的时间。至于每天的伙食，虽都是面食蔬菜，但较之小米杂粮的部队生活，自然是好的多了。然而阎锡山为了要使代表们专心为他卖命，便表示对代表们的生活关心，特于第五天下午，着该食堂办理一顿饺子给代表们吃。王靖国特代表阎锡山和代表们聚餐，并且还讲了话，除了说了一大堆反共言论外，并问代表们：“你们回到部队后怎么办才能达到你们‘安家立业’的目的？”这些代表们异口同声地说：“要把会长关怀我们的心情向部队传达，要和全体士兵一起同共产党干到底，如果谁不拿出性命来干，我们就要当场打死他。”王靖国满意地向代表们敬饺子，我也随着王的行动而敬起饺子来，要求他们要说到做到。在大吃特吃饺子的声中，阎锡山的“士兵代表会议”就宣告收场了。

“尊军献肉”

阎锡山在“士兵代表会议”时，给士兵开下了迷惑士兵而永远不能实现的“安家立业”的空头支票后，军政人员纷纷祝贺这次会议的“成功”，并在部队中掀起了一个反共的高潮。但是阎锡山知道，这个画饼充饥的“安家立业，”只能玩弄于一时，决不能维持长久，于是他又异想天开，用现实的小恩小惠——“尊军献肉”，来“改善”士兵生活，再次诱骗士兵们对“安家立业”的信心。这个“尊军献肉”的政策，是从1947年8月在太原市开始试行的，其办法是：凡买肉的人，买一斤出二斤的肉价，所有多出的这一斤肉价，即由包商折合为肉，拨归部队士兵食用。并规定士兵每人每月吃半斤肉，并责成由太原市商会承办，8月9月均为试办月，这两个月中共收到法币有39亿之多。阎锡山

看到自己一毛不拔的“尊军献肉”的做法能达到以猪肉换人肉，叫士兵为他卖命的目的，于是他就通令全军，自1947年10月份起，士兵每人每月可以领到半斤猪肉。着其统治区内各县执行“尊军献肉”政策，并责成“整军会议生活组”负责收发事宜。我当时就是该组的少将组长。至于各县市交肉的多少，完全由政府强迫规定，当时除了发给各部队的外，大约还有一半的富余，所有剩余的肉，自然是折成法币，由“整军会议”收集后，再交到阎锡山那里。所有八九月份在太原市试办的39亿多元的法币，也毫不例外地落入阎锡山的腰包了。“整军会议”向阎锡山处交这批款的日期，故意迟延些日子，套买黄金获利，而各部队又是多报空额冒领，此事成了负责承办的军需人员和主官发财的机会。1948年晋中地区大部解放，解放军快到太原的前夕，王靖国在他的住宅内庆贺他的生辰，所有在太原的军政人员，大部均携眷前去祝寿，川流不息的酒筵，自早至晚连续不断，其中所用的猪肉1000多斤，也完全是在“尊军献肉”项下开支的。所以这“尊军献肉”变成了军中上下争利、享乐的源泉，实际落到士兵身上的却是无几了。这就是阎锡山“尊军献肉”的真相。

“铁训会”

“铁训会”就是“铁军训练会”的简称，这又是阎锡山继“士兵代表会议”、“尊军献肉”后，要士兵为他作炮灰，进一步反人民，玩弄士兵的一个鬼把戏。阎锡山拿出他的反共王牌组织“三三铁血团”，将士兵用这个组织紧紧地捆起来。但是“三三铁血团”又是个秘密组织，对外从未公开过，而铁军又是该组织内的一个通用代名，于是在1947年冬季在万柏林营房内，着王靖国办理“铁训会”，就是将士兵分批分期地吸收到该组织来，其中也有些军官未参加该组织的，也同时在受训期间加入，每半月

一期，每期为 800 人，分四个队，队长由师、团长轮流担任，除了当时有“特种警宪处”处长徐端（山东人，是个叛徒）、“警务处”处长杨贞吉（山西应县人，解放后在太原被人民政府枪决）来会讲些反共谰言外，其余都是一般的军事课程，与该铁血团办理入团手续的事宜，而尤以后者为主。

（一）“三三铁血团”的实质

阎锡山的“三三铁血团”就是“山山铁血团”，山字就是三的代替，在该团的“经典”中即有山字就是三字的解释，因为三字是该团规定从阎锡山以下的 28 个发起人，为第一层，每人可介绍三人人团为第二层，而第二层每人可介绍三人人团为第三层，依次类推每人介绍三人人团为第四第五……层。所以该团是三三制而取名为“三三铁血团”就基于此，但又为防止泄露计，所以又称为“山山铁血团”，而山山又含蓄着山西的山与阎锡山的山，也正是山西阎锡山的“山山铁血团”的意思。该铁血团是在 1939 年全国反动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时候，由薄一波、廖鲁言等领导的各抗日决死队与政卫队等，看见阎锡山派遣了他的妹丈梁缙武作他的代表住在太原，勾结日军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宣布与阎锡山脱离关系后，阎锡山为了维持其反动统治势力，由王靖国纠合了极顽固反动军官商得功（山西繁峙县人，曾充任阎锡山副军长，1948 年死于太原）、王乾元（山西洪洞县人，曾充任过三十四军军长，解放后在太原被人民政府枪决）等 28 人于是年 10 月 15 日深夜，在陕西省宜川县秋林镇阎锡山的家内，室外由阎锡山的女人担任警戒，他们在室内和阎锡山共同歃血为盟，誓死拥阎反共而建立起来的。其誓词及纪律如下：

誓 词

宣誓人 × × × 誓以至诚亲爱团结用铁血拥护会长阎百川

先生，坚决执行会长一切主张，以生命付诸组织，与组织共存亡，始终到底。谨誓。

纪 律

凡我同志犯下列各条之一者，除本人受组织最严厉之处分外，参加组织者，情甘连座，施行集体制裁。

- 一、脱离组织背叛组织者
- 二、阴谋破坏组织者
- 三、泄露组织秘密者
- 四、不服从会长指示及组织决议者
- 五、违背会长主张及诬蔑会长言论者
- 六、私行诬蔑同志者
- 七、不积极努力组织工作，致组织受重大损害者
- 八、犯烟、赌、赃、欺之一者

宣誓人×××（下填该团的化名）盖血指印

中华民国 年 月 日

这些“誓词”“纪律”是参加该团的每一个人都要遵守的（阎锡山除外），而阎锡山也给该铁血团立下了他的守约如下：

山山铁血团守约

誓竭一生心身力量在革命线上用以：

铁血主公道，

大家如一人。

共生死利害，

同子女财产。

阎锡山

中华民国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

我所知道的阎锡山

这个“守约”是阎锡山亲自写在一块红绸子上，交由该团保存的。这是该铁血团成立的由来和经过。

该铁血团自成立后，即开始在军中由王靖国等 28 人分头拉拢军官们参加，参加的仪式最初是由阎锡山亲自主持，先在室内悬挂阎锡山的巨幅画像，像前设一方桌，桌上敷以白布，并点燃两支白蜡烛。参加的人先将“誓词”、“纪律”写在白布上，放在桌上正中央，其旁放着该团的“守约”，阎锡山立在桌的左前方，王靖国立在桌的右方，由第一层 28 人中的一人担任司仪，其仪式如下：

1. 向会长行三鞠躬礼
2. 宣读誓词、纪律（跪下）
3. 起立
4. 讲解誓词、纪律及守约
5. 盖指印（以针刺破右拇指盖血指印）
6. 退席

举行仪式的时间都是在黎明前，所有阎锡山的警卫人员，都不让到院子里来，警戒任务都由早入团的人担任；以后参加的人数增多，入团仪式即由阎锡山指定该铁血团的特委们担任，他们是王靖国、赵承绶、孙楚、杨澄源、杨爱源、楚溪春、郭宗汾等（这些特委中除了王靖国是该铁血团第一层可以介绍三人入团外，其余虽均加入，但不能介绍，这点又是王靖国、赵承绶在阎锡山面前争权夺利暗中斗争的一个矛盾焦点）。在该铁血团成立之初，阎锡山以维护该铁血团的纪律为名，用大烟水毒死了既是该铁血团的第一层，又是第七十师师长的刘墉之和一个小小的上尉李某（是山西夏县人）后（刘是说过阎锡山贪赃的话，李是因函其在西安工作的娘舅托找工作），使该铁血团的淫威更加嚣张起来，使参加的人堵绝外走的念头（当时有很多中上级军官投奔胡宗南

处，如陈光斗、李生润等均到中央军校七分校担任教官)，挽回他的即将瓦解的统治颓势。

1941年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间，阎锡山在吉县设立建军会，并在乡宁、桑峨、隰县、孝义等处增设建军分会，名义上是建立军队，训练铁军，实际上就是扩大该铁血团的组织，当时各地就有不少的士兵加入，这也就是当时阎锡山向汾东塔山解放区进犯的资本。自1945年人民抗日胜利，阎锡山勾结日军窃据太原后，阎锡山又大量收编日本部队作为他反共的最可靠力量，这时“三三铁血团”处在名存实亡的睡眠状态。及1947年汾孝战役阎锡山的部队被打败了，收编来的日本部队也被解放军打败了，这就使阎锡山重新祭起他的“法宝”，扩大“三三铁血团”到士兵中去。这就是1947年秋到1948年7月积极办理“铁训会”的原因。至于“铁训会”的士兵入团手续，是由“整军会议组织组”少将组长黄国楨负责办理的，王靖国主持一切，所有入团仪式也都在万柏林山王靖国代表阎锡山出席。

(二)“同生死利害”，一片台湾西瓜

“铁训会”每半月一期，每期中阎锡山着由“尊军献肉”项下，发给受训者每人半斤肉，作为“改善生活的犒赏”，每期完了后，还派山西戏院来会演半天戏；最重要的是将受训者带到绥署自省堂，由阎锡山亲自讲话，除了以“绥靖主任”的身份要求士兵们要在战场上为他卖命，以实现士兵的“安家立业”旧调外，并以同志的身份，要和士兵同生死、利害始终到或者是一段香蕉，或者是一片西瓜，以象征着阎锡山和这些“同志们”的“同甘共苦”。

(贾斗魁)

三 晋军概况和“铁军”、“同志会”内幕

晋 军 概 况

我于1918年夏在保定军官学校第五期毕业后，就分配到山西步兵十团充当见习官。这是我参加晋军的开始。当时晋军有四个混成旅、两个独立步兵团、三个独立营，南北两个镇守使（南镇守使署在平阳，北镇守使署在大同），各辖一个混成团。全军番号和长官姓名如下：

(1) 第一混成旅旅长商震；第二混成旅旅长马开松；第三混成旅旅长孔繁爵；第四混成旅旅长赵戴文（赵是个文人，实际上是阎锡山直接指挥）。

(2) 两个步兵团：由阎锡山直接指挥，步九团（学兵团）团长由商震兼任，后由荣鸿胪充任；步十团团长蔡荣寿。

(3) 三个独立营是：工兵营、卫生营、辎重兵营。

(4) 南镇守使（少将级）是张培梅，抗战开始后，任二战区执法总监。因战事失利，他非常恨王靖国在隰县石口子不抗战，曾想杀王，未得逞。后从太原退到大宁时，感到前途茫茫，服鸦片自杀。死后，阎锡山还亲自路过大宁去吊唁。北镇守使是张树帜，抗战开始后，任二战区执法副监。

187

我听说在前清末年，清军驻山西部队当时只有一个协（即旅），管两个标（即团）。阎锡山在辛亥革命时以第二标标统的资格被推举为“山西大都督”（当时第一标统是陕西人黄国梁，平时与革命党、省参议会中人很少联系，而阎锡山是老同盟会员）。阎锡山当了山西督军后，很怕袁世凯撤换他，故对袁毕恭毕顺，小心谨慎。当时他还不暴露他的政治野心，只是保境巩固自己的地位。袁世凯死后，阎锡山才开始有对外扩张的企图。

北伐战争时，阎锡山挂了青天白日旗以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当时我在晋军（北路军）总指挥部前敌总指挥部当少将参谋长。北路军总指挥是商震，前敌总指挥系第七军军长张荫梧兼任。南路军总指挥是徐永昌、杨爱源。当时晋军已经扩充了，记得当时晋军的师长有孙楚、傅作义、杨效欧、傅存怀、王靖国、李生达、赵承绶、李培基、李服膺、孟兴富、关福安等人。此外还有骑兵司令赵承绶、炮兵司令周玳、工兵司令杨澄源、机关枪团团长关颖凯等。

当时晋军的编制是：一个师辖三个步兵团，其中两个团设一旅长任前方指挥，师长直接指挥一个旅长、一个团长。

阎冯倒蒋战役时，晋军为了壮大声势，把“师”的番号改为“军”，兵力稍有增加。我当时任北平中将宪兵司令兼一二五旅旅长。一二五旅改为二十七师时，由原辖两个步兵团扩充为三个步兵团，“旅”的番号取消，实际上我这个“二十七师师长”直辖三个团。

阎冯倒蒋战役失败后，阎锡山潜逃大连，山西省军政大权归徐永昌、杨爱源等人掌握。当时晋军由奉军代管，薪饷由奉军关发。晋军在张学良领导下原封未动。

阎锡山逃大连后，感到前途无望，曾打算出国旅行。后来他又派周熹文、钟建奇二人到江西调查蒋介石能否消灭共产党。据周熹文回来报告说：蒋介石不能消灭共产党。阎这才取消欧美之行，感觉到蒋介石既消灭不了共产党，也就无余力打晋军。所以他又坐日本飞机回大同，直奔其家乡五台县河边村，并未回太原。当时他曾向蒋介石表示以后不再过问军事、政治，蒋介石因鞭长莫及，对阎也无可奈何，也就算了。几个月后，阎锡山忽然回到太原，徐永昌、杨爱源等当然就把军政大权原封不动地交还阎锡山。阎锡山当时成立了一个“晋绥军军事整理委员会”来整

理军队。

当时晋绥军最危险的有两件事：第一件是官兵吸白面、大烟，又嫖又赌，以致军队腐败，战斗力很差；第二件是军队一度归张学良领导时，大部分带兵官都吃空名字，甚至于一团、一营、一连的空名字都有。当时奉军点验官因受晋军长官之贿，也装着不知道，所以晋军军官趁这时候发了些财，以致多数军官贪污腐化。阎锡山回太原后，下决心先从整理晋绥军着手。阎整理军队后，晋绥军吃空名字的风气才被压下去。晋绥军军事整理委员会又实行戒烟办法，将军官分别调验，染毒的才陆续减少。整理委员会只是整理内部，并未缩减军队编制。

阎锡山当时还不敢公开抓山西的军政大权，在军事政治方面他假意认输了，所以他一方面整理晋绥军，一方面实行他的所谓“造产救国十年计划”。首先，他建立了“西北实业公司”，秘密整理兵工厂，以巩固其经济和武器装备的基础；另外又修筑同蒲路，实行兵工筑路计划，并采用窄轨制，以防外面势力侵入山西。他当时曾编有所谓《将来希望歌》，记得歌中有这样的词：“无山不树林，无田不水到；无村不工厂，无乡不职校；无人不劳动，无人不入校；无人不当兵，无人不公道。”

阎锡山在其羽毛未丰满前，采取的是“自顾防守”的策略。

自1934年到1937年，我到“陆大”学习深造，这一阶段据我所知，晋军无大变化。

抗日战争开始后，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下辖两个集团军：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是杨爱源；第七集团军总司令是傅作义（当时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是朱德总司令，名义上属二战区指挥）。

此外，又成立所谓“新军”四个旅：第一旅旅长鲁英麟，政治部主任薄一波；第二旅旅长艾子谦，政治部主任张文昂；第三



阎锡山（右）就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1936）

旅旅长李廷秀，政治部主任戎子和；第四旅旅长梁浩，政治部主任雷任民。另有一个工人武装自卫队，负责人是郭挺一，实力编制等于一个旅。

阎锡山当时所以要成立新军，是因为他感到原旧军不能抗战，想利用一批有为的青年来领导军队，同时并组织“公道团”、“牺盟会”、“同志会”，用意都是防止人们背离他。新军编制与旧军同，一个旅辖三个团。新旧军的区别是：新军有政治领导，不仅是旅有政治部主任，团、营、连都有政治主任或指导员。在武器装备方面，比起旧军来，新军是用的山西兵工厂新造出的武器。

新军在“牺盟会”的领导下，不同意阎锡山对日本的投降办法，最后脱离了晋军，起义参加了革命。阎锡山还曾派王靖国、陈长捷率领所部追打新军第二旅，一直追到晋西北。新军第二旅与新军第四旅汇合了，阎锡山没达到消灭的目的。其他新军两个旅就近在晋东南与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取得了联系。

抗日战争中，忻口战役失败后，阎锡山决定退出太原，而却

令第七集团军傅作义部固守太原。傅作义部经几天血战后，经汾河退往晋西北回绥远。从此，傅作义部队渐渐脱离了阎锡山而直接归国民党政府指挥了，但原第七集团军的番号仍留在二战区未动。到了这个时候（1939年），阎锡山实际兵力就剩下了一个第六集团军的兵力了。

后来阎锡山为了维持面子，又请求国民党政府军委会增加了两个集团军的番号，即除原第六、第七集团军之外，新增加了第八、第十三集团军，合起来就有四个集团军的番号了。这四个集团军是：第六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后改为陈长捷，杨升副长官）；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第八集团军总司令孙楚；第十三集团军总司令王靖国。

四个集团军一共辖八个军，每一集团军辖两个军，每军辖二三个师，每一师辖三个团。

同时，二战区又设立了南、北区军总司令部。北区军总司令部设在孝义，司令是楚溪春；南区军总司令部设在吉县，司令是彭毓斌。抗战胜利后，南区军到晋东南与八路军作战，全军覆没，彭被击毙，一些高级军官被俘，南区军总司令部撤销。

阎锡山的四个集团军是兵团性质的部队，集团军总司令全驻在二战区长官部，其兵团部队以军为单位，机动地换防、调动，分别属南、北区军总司令部指挥。南区军总司令部撤销后，晋南各地由晋军以“军”为单位驻防指挥作战。

抗日战争胜利后，阎锡山除有原四个集团军兵力外，又收编了投降的日本兵近万人，分三个纵队，统归赵承绶接头办理，详情不知。

1947年部队整编，将“军”编为“师”，“师”缩为“团”，以致军官失业的很多。阎锡山为了收容这批军官，又成立了军官教导团，当时军官的情绪很愤怒。

以后，我和阎锡山意见不和，脱离了晋军。

晋军的军官干部，除一部分高级将领是陆大、日本士官及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生（主要是保定军官学校毕业生）外，大部分是阎锡山自己设立的“学兵团”、“北方军校”、“教导团”、“青年军官教导团”等学校培养出来的，绝大部分都是山西人。

“铁军”的内幕

阎锡山为了加强对晋军官兵的控制，保持他个人的独裁统治，曾在抗日战争中期组织了一个“铁军”组织。

当时国民党中央政府所给晋军薪饷，多被阎锡山挪用开销，以致晋军的服装、伙食非常困苦。当时官兵苦到吃山药蛋粉的程度（吃这种东西不经饿），军衣破破烂烂，尤其冬委制服都是旧棉花，不能御寒，因之军心低沉，战斗力差。因此，阎锡山就玩了一手阴谋，组织了这个“铁军”组织，来加强控制。

我当时在孝义兑九峪指挥北区军对日抗战。有一天，一个名叫高冰的，奉阎锡山差派到兑九峪来，晚间向军事高级官员讲话时，提到我，称呼我为“楚铁委”。我很奇怪，会后问他，他才告诉我，原来阎锡山组织了一个铁军组织，并内定我是“铁军委员”。我对这个组织的经过和内幕，当时一点也不清楚。

几个月后，我回到二战区长官部（在山西吉县），阎锡山就命我宣誓入铁军组织，并由王靖国事先拟好誓词，交我背诵。

每二天早上3点钟鸡叫的时候，我被王靖国（集团军总司令）、杨爱源（副长官）请到一个布置得很庄严的小窑洞里去。一进门，看到正面挂着阎锡山的相片，桌上摆着阎锡山亲笔写在一幅红缎子上的铁军誓词，桌上两旁点着一对大红蜡烛，气氛很令人恐怖。我再一看，阎锡山就坐在桌子左前方，态度很严峻；杨爱源和王靖国站立阎锡山的两旁。

他们事前已告知我，一进门就要先给会长行鞠躬礼，然后正面跪在桌子前面。我就照这样做了。当时宣誓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双腿跪在地上，举起右手背诵了一遍我事先已背熟了的誓词（现在已记不清了）。随后，阎锡山亲口将桌子上那张他亲笔写在红缎子上的几句守约念给我听，我现在还记得是这样几句：“铁血主公道，大家如一人，同子女财产，共生死利害。”另外尚有纪律八条，详细的我已记不清楚了。宣誓完毕后，王靖国亲手交给了我一根钢针，叫我将左手中指刺破，将中指血印印在自己的誓词上，然后起立又向阎锡山行90度的三鞠躬礼。阎锡山这时站起来和我握了握手，说：“晴波，你很好，努力吧！”于是我就同杨、王二人退出窑洞。

这就是我入铁军组织宣誓的情况。

就我后来所知道的，这个铁军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会长）是阎锡山，实际负责人是王靖国。“铁委”是高级领导干部。我记得“铁委”有杨爱源（尔后升为副会长）、王靖国、赵承绶、孙楚、杨澄源、郭宗汾、彭毓斌、楚溪春等。“铁委”下又设“二十八宿”（就是28个地位次于“铁委”的高级军事干部，多是军、师长一级的负责人，也有地位较低的），这“二十八宿”是做实际工作的，由王靖国统一管辖。“二十八宿”的军官姓名，我记不清楚了。

193

我入铁军组织以后，奉阎锡山命令回到孝义兑九峪北区军总部后，就开始着手发展铁军组织。我当时就命令当地“组、政、军、教、经统一工作委员会”中负责组织工作的人同负责军事工作的人共同商量如何发展组织，在军队发展哪一类的军官。实际工作就归这两个负责人来管。我呢，就只是在他们宣誓的时候到场，装着像我在宣誓时阎锡山对我的那副架子。入铁军组织，是事先编好十个一组，分别陆续入堂宣誓。他们一进来就先给我鞠

躬，然后就跪在阎锡山相片前，桌上也是摆上阎锡山亲笔写的红缎子的誓词，点上一对大红蜡烛。我呢，也是照样坐在桌子的左前方，两边站的是“组”、“军”两个负责人。他们和我过去入组织时的仪式一样，跪着举右手宣誓，然后我把红缎子上的誓词宣读一遍，他们也刺血印手印。礼成，我也如法炮制地同他们握握手说：“你们很好，努力吧！”

举行宣誓仪式都是在下午。当时入组织的很多，大部分的中、下级军官都入了“铁军”组织。

由以上看来，阎锡山是为了挽救他的动摇的统治，才想出这个办法来欺骗、笼络他的部下，企图用原始的歃血为盟的办法把人笼络在一起为他卖命。

此外，阎锡山还用“服务士”来监视军、师长。他训练了一批十三四岁的儿童做服务士，分配给军、师长每人两名（总司令以上官员不派服务士）。这两个服务士每天服侍军（师）长，扫地、倒茶，什么都干，你会客谈话都不能回避他们，他们并有随时出入你寝室的自由。每天晚上，这两个小服务士要把这个军（师）长的一天行动、言论统统写在报告上，直接寄给阎锡山。各军（师）长明知这是监视他，打小报告，但绝不敢干涉，因为事先讲明：如有干涉，是要受处分的。小服务士写什么，这个军（师）长也不敢看，更不敢干涉，只能心里暗地害怕，无法阻拦。其实，这种办法只能使大家人心惶惶，增加对阎锡山的不满，起不了什么大作用。

“同志会”的内幕

抗日战争前，山西已有“公道团”的组织。抗日战争开始后，阎锡山在太原又成立有“牺盟会”的组织，当时参加的多是山西政界的文人，军人参加的很少。以后撤退到临汾温泉村时

候（1938年春），阎锡山与薄一波、梁化之等人商量组织“同志会”。当时我任二战区参谋处长，“同志会”发起人共有“高干”13人，我是其中之一。这13人是：朱绶光（二战区参谋长）、贾景德（二战区秘书长）、续范亭（二战区高参兼西北区动员委员会主任）、王怀明（二战区军法处长）、王谦（省府秘书长）、邱仰浚（省府民政厅长）、杜春沂（卫队旅旅长）、梁化之（二战区政治部主任）、李冠洋（省府委员，给阎锡山办组织工作的人）、薄毓相（“公道团”负责人）、陈长捷（军长，当时在长官部驻防地）、彭毓斌（师长，当时在长官部驻防地）、楚溪春（二战区参谋处长）。

这个组织是军、政、民统一领导的组织，会长是阎锡山。从那时起，山西军政人员对阎锡山不称“司令长官”和“总司令”，一律称“会长”，渊源在此。

我虽是发起人之一，但详情我却不十分清楚。当时“同志会”负实际责任的是梁化之等人。后来军政人员如赵戴文充任“同志会”的副会长，杨爱源、孙楚、王靖国、赵承绶、薄一波、戎子和、雷任民、韩钧等也都充当“同志会”的“高干”了。

“同志会”的目的表面上是由民族革命达到民族复兴；实际上是把山西的军政人员笼络在一起，为阎锡山效忠卖命。我记得还有这样的誓言：“终身不准脱离组织和背叛组织，如有背叛组织、脱离组织的一律自裁”；“如有人暗地对会长不满或侮辱会长的一律自裁”；“犯烟、赌、脏、欺之一者，一律自裁”（按：烟就是吸大烟；赌就是拿赌具赌钱的，甚至拿赌具玩耍的也要自裁；脏是贪污，阎锡山对这条订得特别严，就是贪污一块钱的也要自裁；欺是指欺骗长官和部下而言，尤其是欺骗会长的，一律自裁）。

“同志会”的组织系统是：会长——副会长——高干——基干——同志会先锋队（同先）和会员。“高干”可以介绍多少人

为“基干”，“基干”可以介绍若干人为“会员”。“高干”介绍的“基干”的人数越多，在会里的势力也就越大，如梁化之、王靖国、赵承绶等都是介绍“基干”几十人入会的“高干”，所以他们在会里的势力很大。我只介绍过一人入“同志会”为“基干”，就是今天山西人民委员会民政厅厅长杨自秀。

当时“同志会”每年选举一次“高干”，按票数多少来决定“高干”的去留。按我在会里的势力，我只有一名“基干”，本应落选，但因为我担任“北区军总司令”的职务，所以每次选举时，阎锡山总要授意梁化之等人非要把我选出当“高干”不可。因为那时只有“高干”才能有资格当山西的军政大员。晋军军队里的军、师长大部分是“基干”，这些人后来又被提升为“高干”和“候补高干”的也不少。

我虽然是“高干”，但始终不知道入会的仪式是怎么回事。

我只知道有两件事，足以说明阎锡山是怎样利用“同志会”来起恐怖作用，残害部下，叫人终身唯唯诺诺，不敢脱离他，不敢犯他的“戒条”。

第一件事是，晋军师长刘墉之的自裁。这个人是河北省人，由山西学兵团毕业后又在陆大毕业，从当排长起一直跟随阎锡山，可以算是亲信。有一次他在防地上说过这样的话：“中央领到的款，完全被会长扣了，他还口口声声说怕我们贪污”，“什么‘同志会’呀！简直是以‘同志会’为捆仙绳，将我们捆住，终身为他卖命，不准脱离他。”这几句话由他的参谋长姜焕章和当地的“组政军教经统一工作委员会”主任（这个职务权力很大）孟际丰告密给阎锡山。阎锡山马上用电报将刘墉之调回二战区长官部问明事实。刘完全承认，并哀求阎锡山：“今后背后决不再说侮辱会长的话。”而阎锡山却授意王靖国等几个“高干”开会（当时我在中条山作战，未参加会），决定令刘自裁。决定后就由

于振河、孙福麟两个军长给刘拿去一大玻璃杯鸦片烟浆水。刘见之势已至此，只好举杯几口喝下，左右手拉住于、孙两人的手痛哭说：“家中有 70 多岁的老母及家室，请你们关照。”但是，他喝下大烟后许久总是烧不死，他们就用绵纸盖其面，喷以冷水，不久其气息即断。当时军政人员知此事后大部分不满，但没有敢说话的。

第二件事是，有一夜张子佩、郝梦九、曹大观、李生瀛四人在李冠洋家里拿牌九抓大头玩，讲明谁输了谁请吃饺子。这件事不知怎的被南村宪兵司令樊明渊的宪兵告发，阎锡山立即派人搜捕。张子佩马上蒙上被子装着睡觉。郝梦九是“同志会”会员，但不是“基干”，后来又有徐永昌来电保释，所以只受到驱逐出境的处分，跑到西安去了。李生瀛不是“同志会”会员，没有事。只有曹大观是“同志会基干”，所以就被决定自裁了。

从这两件事来看，这完全是阎锡山牺牲一些倒霉的人来增加他自己的个人威信，至于真正的有势力的“高干”如王靖国等人，他们公开和部下眷属姘居并有种种贪污行为，也从来无人敢告发，阎锡山也装着不知道。

抗战胜利后，“同志会”的做法就更加残忍了。当时有一个团长叫赵俊义的，原来驻在山西寿阳、孟县一带。他把与解放区对峙的地区划成真空地带，实行他的所谓“三自政策”（自清、自卫、自治），也就是山西当时所谓的“赵俊义奋斗法”。对凡有共产党嫌疑的人，一律用乱棍打死。听说平遥一县，就打死了几百人。实行“赵俊义奋斗法”以后，据说被乱棍打死的人总共约有 5000 人以上。

当时在晋中和晋东南一带实行这个办法，而我在晋北，虽未亲眼看到，但闻知后也甚感愤恨。

（楚溪春）